

# 陈朝统一南方过程中的文化向心力与政治认同塑造

李磊

**摘要:**以文化认同沟通朝野、争取人心归附,这是魏晋南朝的塑造政治认同的新路径。梁陈之际,无论是旨在建构王朝的陈霸先、王琳,还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均以争取士人归心来塑造政治认同。陈武帝翦除各方势力的过程,同时也是将各地士族纳入政权的过程。称帝前夕,陈武帝在各州恢复中正之职,规定“中正押上”为选官的必经程序。陈朝官制按照士族的立场划分清、浊官。陈武帝举办众多的文教活动以展现与士族的文化共识。陈朝迎合士人政策的出台,与其面临萧庄朝廷的挑战有关。支持萧庄朝廷的,除了王琳势力,还有陈郡袁氏、庐江何氏、南阳刘氏、吴郡朱氏等,他们以文书制作、历史撰述塑造对萧庄朝廷的正统性认同。割据势力如鲁悉达、陈宝应、欧阳颢等人,招纳流寓其地的士人以赢取声誉、巩固统治。陈文帝翦除各地割据势力的同时,以文化认同来缝合政治裂痕。他以学校设立为契机,将政治疏离派、隐逸派、流寓士人任命为学官。陈宣帝、陈后主则通过举办释奠礼等文教仪式,激发士族的王朝认同。文化向心力在陈朝的认同塑造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陈朝;士族;文化向心力;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3-0119-09

以人心、民意为权力的正当性来源,这是先秦以来的政治传统<sup>[1]</sup>。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王朝认同的塑造方式却要复杂得多,其中的关键点是将人心视作需要说服的对象,还是视作需要顺应的力量。秦朝以兼并天下的功业来宣扬其具有治理天下的正当性,汉朝以命定与命数来阐释王朝的正统性<sup>[2]</sup>,这些政治宣传均是以人心为说服对象。与秦汉不同,汉魏之际曹操父子面对的新局面是,以文教立身的世家大族在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中已经掌握了政治评判权,曹氏父子不得不承认他们代表着人心,并进而顺应其文化认同,通过文学交汇来获取政治声望,将之作为建立政权的舆论基础<sup>[3]</sup>。可以说,以文化认同沟通朝野、争取人心归附,这是汉魏之际曹操父子开创的塑造政治认同的新路径<sup>[4]</sup>。九品中正制建立后,世家大族转化为门阀士族,自此以后,魏晋南朝历代统治所需的民意基础,便是指士

族的人心归附。《南齐书·褚渊王俭传》所言“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sup>[5]</sup>,正是士族居于政治评判的位置上,对王朝易代秉持超然态度的表现。

从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举兵开始的二十余年间,梁朝旧疆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永定元年(557年)梁陈易代后,陈朝的主要政治任务便是逐步平定各地割据势力,这一任务直至太建二年(570年)平定广州欧阳纥才大致完成<sup>[6]</sup>。在军事斗争的同时,陈朝与各方势力还展开了人心争夺。陈朝以接续晋宋齐梁正统自居,故而将争取士族的人心归附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割据群雄为了实现地方统治,也须获得士族的配合。陈朝与割据势力竞相招贤纳士的过程,也是争相进行文化建设的过程。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此过程予以阐述<sup>①</sup>,借以展现在南方统一过程中文化向心力在塑造政治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期能够深化理解中国古代王朝

收稿日期:2024-1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六朝京畿建构与江东社会变迁”(23YJA770008)。

作者简介:李磊,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治理的运行逻辑。

## 一、陈武帝塑造政治认同的文化路径

绍泰元年(555年)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并占据建康,成为梁朝的主政者,自此之后,争取士族的支持便成为其能否建立政权的关键所在<sup>[7]</sup>。

除了居处于建康的士族,地方势力割据地区的士族也在陈霸先的招纳范围之内。翦除割据群雄的过程,便是他招纳士族的过程。陈霸先主政后的用兵,除了抵御北齐之外,主要是进占三吴。陈霸先是吴兴长城人,吴兴士族如沈氏、章氏等为其政治基本盘。吴郡士族如陆氏、张氏、顾氏在侯景之乱中受到沉重打击,陈霸先启用的是留居建康的各姓代表人物<sup>[8]</sup>。会稽士族则因张彪割据其地抵御侯景而与之有所关联。太平元年(556年)陈霸先派遣周文育、陈蒨击败张彪<sup>[9]</sup><sup>145</sup>,随即起用会稽士族。当时,会稽士族的领袖是名士虞荔,陈霸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丧乱已来,贤哲凋散,君才用有美,声闻许、洛,当今朝廷惟新,广求英俊,岂可栖迟东土,独善其身?今令兄子将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虚迟也。<sup>[10]</sup><sup>257</sup>

表达了“朝廷惟新,广求英俊”的纳贤之意。陈蒨也劝说虞荔出仕:

君东南有美,声誉洽闻,自应翰飞京许,共康时弊,而(刻)[削]迹丘园,保兹独善,岂使称空谷之望邪?必愿便尔傲装,且为出都之计。唯迟披靽,在于兹日。<sup>[10]</sup><sup>257</sup>

认为虞荔作为名士领袖,应该担负起“共康时弊”的责任。《陈书·虞荔传》云:“迫切之不得已,乃应命至都。”<sup>[10]</sup><sup>257</sup>虞荔之所以不得不应命到都城,乃在于应召并非虞荔的个人选择,它还意味着会稽士族向陈霸先款诚之意。

太平二年二月,即梁陈易代的前夕,陈霸先以梁敬帝的名义下诏:“诏求鲁国孔氏族为奉圣侯,并缮庙堂,供备祀典。”<sup>[11]</sup><sup>249</sup>册封孔子后人、修缮孔庙、举办祀典等,乃是陈霸先迎合士族、塑造文化认同的方式。同月,“又诏诸州各置中正。旧放举选,不得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其选中正,每求耆德该悉,以他官领之。”<sup>[11]</sup><sup>249</sup>

陈霸先恢复了中正制,在诸州置中正,选“耆德该悉”的官员兼任中正。选官量受必须先经由“中正押上”这一程序。这其实是在梁末丧乱背景下

重申了士族在本籍州郡的选举权利。陈霸先以通过恢复士族传统政治权利的方式,展现其对士族传统的维护。

陈朝建立后,进一步恢复了清、浊官的规制,《隋书·百官志上》载陈朝官制云:“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sup>[12]</sup><sup>748</sup>陈朝清、浊官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官阶,而在于是否为士族所乐任且具有文化性质<sup>[13]</sup>。陈朝以清浊论官,实是站在士族政治文化立场上建构政治体系。

陈霸先即皇帝位后,频繁举办文教活动,以此来塑造向心力。据牟发松先生研究,自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位至永定三年六月丙午崩殂,陈武帝共在位20个月,举办的与文教信仰有关的活动便有14次之多。这些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尊崇都城建康的城隍神蒋子文、帝乡吴兴郡楚王神项羽。另一类与佛教有关,包括修复及创建寺庙,招徕名僧与优待僧尼,举办大型佛事活动等<sup>[14]</sup>。众所周知,南朝侨姓士族聚集于建康并在会稽置产兴业,吴姓士族则在三吴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东晋以来,佛教发展迅速,至梁陈之际,侨、吴门阀崇信佛教者众多。因而,无论是尊崇建康城隍、吴兴楚王神,还是举办佛事,陈武帝的目标人群皆为主导文教的士族<sup>[15]</sup>。

陈武帝塑造文化向心力的方式,乃是通过举办大型活动或者推动具有话题性的事件来完成的。《陈书·高祖纪下》载:

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自阙前礼拜。初,齐故僧统法献于乌缠国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监末,为摄山庆云寺沙门慧兴保藏,慧兴将终,以属弟慧志,承圣末,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sup>[10]</sup><sup>34</sup>

此事发生在陈武帝即位后的第六日(永定元年十月庚辰),牟发松先生认为陈武帝展出的佛牙未必与法献所获的是同一枚,但展出佛牙选择在具有富贵、长寿象征意义的杜姥宅,以及同时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其目的在于吸引舆论关注、影响民心之所向<sup>[14]</sup>。次年(永定二年)五月,“辛酉,舆驾幸大庄严寺舍身。壬戌,群臣表请还宫”<sup>[10]</sup><sup>37</sup>。同年十二月,“甲子,舆驾幸大庄严寺,设无碍大会,舍乘舆法物。群臣备法驾奉迎,即日舆驾还宫”<sup>[10]</sup><sup>38</sup>。陈武帝这两次舆驾幸大庄严寺舍身、舍乘舆法物,均为“祖梁武之遗规”<sup>[16]</sup>,即通过效法梁武帝的崇佛行为引发包括群臣在内的广泛社会关注,借以展示陈朝与梁朝对待文化传统的一致性,进而塑造陈朝的政治正统性。

可以说,陈武帝采用了迎合士族文化认同的途径来建构陈朝统治的正当性,士族以配合皇权、追慕皇帝的方式来表达其归附之心,文教活动则是双方意愿达成的场合。《陈书·高祖纪下》载,永定二年三月,“乙卯,高祖幸后堂听讼,还于桥上观山水,赋诗示群臣”。<sup>[10]36</sup>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未收录陈武帝诗作,联系上下文,其于乙卯日的赋诗题材或与后堂听讼、桥上观山水有关。关于陈武帝的文化面貌,《陈书》本纪述其“少倜傥有大志,不治生产。既长,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sup>[10]1</sup>。《南史·陈本纪上》载其“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sup>[11]257</sup>。《陈书》《南史》皆未言及陈武帝的文才,可见陈武帝向群臣赋诗,恐非兴趣使然,而是与时局有关。《陈书·高祖纪下》在记述完陈武帝赋诗一事,又云:“是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于郢州。”<sup>[10]36</sup>《陈书》的叙事暗含着对陈武帝赋诗的背景解读。

王琳为梁元帝旧将,他于陈霸先称帝的当月便在沌口之战中击败陈军主力,俘获主将周文育、侯安都,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永定二年三月,王琳从北齐迎回梁元帝孙永嘉王萧庄,立其为梁朝皇帝,获得了政治优势,陈朝的统治合法性被严重削弱。为了应对这一局面,陈武帝颁布赦除诏书,“西寇自王琳以下,并许返迷,一无所问”<sup>[10]36</sup>,试图瓦解王琳势力。在赋诗的次月(四月)乙丑,陈武帝命中书舍人刘师知杀害了梁敬帝<sup>②</sup>,这也是受制于萧庄朝廷的非常之举。六月己巳“诏司空侯瑱、领军将军徐度率舟师为前军,以讨王琳”<sup>[10]37</sup>,陈武帝继续在军事上保持主动性。

三月乙卯的赋诗目的在于安定朝中群臣。据万斯同《陈将相大臣年表》,永定二年的任职情况为:琅琊王通为尚书仆射,陈郡谢哲为吏部尚书,吴兴沈众为中书令,宗室陈蒨、吴郡陆缮、陈郡袁枢为侍中<sup>[17]</sup>。

这些高层官员是梁武帝赋诗的重要对象。王通为梁武帝外甥,他在侯景之乱中奔于江陵,任梁元帝散骑常侍,迁守太常卿<sup>[10]237</sup>。谢哲在梁朝以秘书郎起家,累迁为广陵太守<sup>[10]277</sup>。陆缮在梁朝以宣惠武陵王法曹参军起家,承圣年间被梁元帝委任为中书侍郎,掌东宫管记<sup>[10]302</sup>。袁枢“家世显贵,资产充积”<sup>[10]240</sup>,起家梁秘书郎,历太子舍人等清显之职,其父袁君正曾任邵陵王(萧纶)友<sup>[9]456</sup>,其弟袁宪娶简文帝之女<sup>③</sup>。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为侨姓高门代表,吴郡陆氏为吴姓高门代表,王

通、陆缮为梁元帝旧臣,王通、袁枢分别为梁朝血亲、姻亲,陈武帝向他们赋诗,目的是在王琳立萧庄继承梁朝法统之时,争取侨、吴高门的支持。

王通之弟王质的被杀,反映了陈武帝对高门士族既须拉拢、又相猜忌之心。王质为梁武帝外甥,其仕宦经历与王通大致相同。他在侯景之乱中西奔荆州,梁元帝以之为右长史,带河东太守。梁元帝即位后又任其为侍中,出为持节、都督吴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吴州刺史,领鄱阳内史。《陈书·王质传》载:“永定二年,高祖命质率所部逾岭出豫章,随都督周文育以讨王琳。质与琳素善,或潜云于军中潜信交通,高祖命周文育杀质,文育启请救之,获免。”<sup>[10]248</sup>王质与王琳的交好,当缘于二人均供职于梁元帝江陵朝廷,这是其受到陈武帝猜忌的重要缘由。陈武帝接到王质与王琳互通声息的报告后,随即便命周文育杀掉王质。

与王质相比,陈武帝更为信任的是陈郡谢哲。在陈武帝一朝的高层官僚中,谢哲是较早投靠他的高门士族,而且谢哲未曾奔赴梁元帝江陵朝廷,在政治上与萧庄、王琳势力较为疏远。永定二年六月出兵征讨王琳后,陈武帝于当年七月甲辰“遣吏部尚书谢哲谕王琳”,八月“谢哲反命,王琳请还镇湘川,诏追众军缓其伐”<sup>[10]37</sup>。在谢哲出使期间,不仅被俘的陈军主将周文育、侯安等人逃归,而且陈朝还争取到王琳承诺退兵、双方休战这一较为有利的外交结果。

陈武帝对待王质与谢哲的态度,代表了其士族政策的两极。招贤纳士、向群臣赋诗,是以迎合士族文化的方式争取他们的支持,一旦察觉其政治立场的动摇,便转为打击。

## 二、萧庄朝廷的政治认同塑造

陈朝建立之际,实际统治的区域主要是建康附近及三吴地区<sup>④</sup>。梁朝故地,还存在着诸多的割据势力。对于这些割据势力而言,他们同样需要塑造自身统治的正当性,通过争取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影响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这种建构方式与陈武帝的方式是类似的。在众多的割据者中,长江中游的王琳对陈朝的威胁最大。除了击败周文育、侯安都所率的陈军主力之外,王琳还立萧庄为帝延续梁祚,动员流寓于湘州、郢州的士族参与萧庄朝廷,与陈朝形成分庭抗礼之势。陈郡袁氏在萧庄朝廷中起着重要作用。

据《陈书·袁泌传》，侯景之乱后，袁泌被王僧辩表为富春太守兼丹阳尹。王僧辩迎贞阳侯僭位，袁泌出任侍中，又奉使于齐。“高祖受禅，王琳据有上流，泌自齐从梁永嘉王萧庄达琳所。及庄僭立，以泌为侍中、丞相长史。”天嘉二年（561年）王琳势力被瓦解，“众皆奔散，唯泌独乘轻舟送庄达于北境，属庄于御史中丞刘仲威，令共入齐，然后拜辞而归，诣阙请罪，文帝深义之”<sup>[10]245</sup>。袁泌为袁君正之弟，为陈朝侍中袁枢的叔父。他在梁陈易代之际投靠萧庄、王琳。在萧庄朝廷中，袁泌所任侍中、丞相长史已是最高职位，仅次于丞相王琳。王琳先是被北齐拜为梁丞相，萧庄即位后再次确认了他的丞相之位<sup>[18]434</sup>。除袁泌外，其侄袁奭亦任职萧庄朝廷，承担与北齐的外交之责。《北齐书·文苑传》载：“袁奭，字元明，陈郡人，梁司空昂之孙也。父君方，梁侍中。奭，萧庄时以侍中奉使贡。”<sup>[18]626</sup>袁奭为袁枢的从兄弟。袁枢的叔父袁泌、从兄弟袁奭均在萧庄朝廷任职，这是陈武帝在萧庄即位的当月向袁枢等群臣赋诗的重要背景，即利用文化向心力对萧庄朝臣产生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认同对双方政治认同的重要作用。

除陈郡袁氏外，庐江何氏、南阳刘氏、吴郡朱氏等侨、吴士族也给予萧庄朝廷重要的政治支持。出任御史中丞的刘仲威出身南阳刘氏，其父刘之遴为梁朝士林领袖，与河东裴子野、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sup>[9]443</sup>。刘之遴担任荆州大中正，负责给荆州士人定品。刘之遴曾进入梁武帝权力中枢，出任中书通事舍人<sup>[9]572</sup>。侯景之乱中，刘之遴避难留在夏口<sup>[9]574</sup>，刘仲威随之在荆州。梁元帝建立江陵朝廷后，刘仲威任职中书侍郎。萧庄立，刘仲威被署为御史中丞<sup>[10]245</sup>。除刘仲威外，南阳刘氏出仕萧庄的还有刘广德。刘广德之父刘之亨，曾任梁朝安西湘东王萧绎长史、南郡太守。南郡为荆州属郡。萧绎（梁元帝）即位后，刘广德以军功官至给事黄门侍郎、湘东太守。“荆州陷后，依于王琳。”<sup>[10]245</sup>南阳刘氏对萧庄朝廷的支持，既源于他们在荆州的地方利益，也源于他们与梁元帝朝廷的历史联系。吴郡朱氏参与萧庄朝廷者为朱才。《北齐书·文苑传》载：“朱才，字待问，吴都人。萧庄在淮南，以才兼散骑常侍，副袁奭入朝。庄败，留邺。”<sup>[18]627</sup>

在萧庄朝廷中担任中书侍郎的是庐江何之元。庐江何氏为侨姓高门，何之元出仕与袁昂（袁泌之父、袁奭之祖）有关。《陈书·文学传》载何之元“为

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监末，昂表荐之，因得召见”。“及昂为丹阳尹，辟为丹阳五官掾，总户曹事。”<sup>[10]465</sup>此后何之元归附梁元帝朝廷。江陵陷落后，何之元被王琳召为记室参军。梁敬帝册封王琳为司空时，除何之元为司空府谘议参军，领记室。萧庄即位后，王琳为中书监<sup>[18]434</sup>，何之元任中书侍郎，在中书省内的地位仅次于王琳。《隋书·百官志上》云梁朝官制：“中书省置监、令各一人，掌出内帝命。侍郎四人，功高者一人，主省内事。”<sup>[12]723</sup>从何之元履历可知，他长期掌管着王琳幕府文书及萧庄朝廷诏令，不仅参与机密，而且也是萧庄朝廷正统论的重要阐述者。在其所撰述的《梁典》序中，何之元写道：

洎高祖晏驾之年，太宗幽辱之岁，讴歌狱讼，向西陲不向东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礼乐，归世祖不归太宗。拨乱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勋有属。今以如干卷为世祖。至于四海困穷，五德升替，则敬皇绍立，仍以禅陈，今以如干卷为敬帝。骠骑王琳，崇立后嗣，虽不达天命，然是其忠节，今以如干卷为后嗣主。至在太宗，虽加美谥，而大宝之号，世所不遵，盖以拘于贼景故也。承圣纪历，自接太清，神笔诏书，非宜辄改，详之后论，盖有理焉。<sup>[10]467</sup>

何之元认为梁朝法统在侯景攻陷建康后出现了分裂：简文帝萧纲虽然有皇帝名分，但是江陵的湘东王萧绎才代表着梁朝朝廷。正因江陵朝廷具有正统性，不仅梁元帝的承圣年号越过简文帝的大宝年号直接延续梁武帝的太清年号，而且萧庄因其为梁元帝之孙的身份，故而为梁朝正统的继承者。在编撰《梁典》时，何之元称萧庄为“后嗣主”，并将其事迹列为独立的卷帙，与禅让皇位给陈霸先的梁敬帝具有同等的地位。关于梁敬帝与萧庄的法统关系，何之元《梁典》总论云：“敬皇继祀而鼎移，后嗣绍基而祚徙。”<sup>[19]3951</sup>将萧庄视作梁敬帝的继任者。《梁典》所述的梁敬帝与萧庄的法统关系，或许便是王琳在拥立萧庄之时所提出的理据。考虑到何之元为王琳记室参军、萧庄朝廷的中书侍郎，这一法统论述即便不由他所提出，但亦会影响到其所起草的诏令文书。

在《梁典》的叙事中，王琳因有拥立萧庄之功而被予以正面评价。《梁典》总论的叙述是：“骠骑王琳，怀申胥之志，蕴荀息之忠，爰纳嗣君，更绍颓运。于是啸命方岳，大兴师旅，龙虎战斗。”<sup>[19]3951</sup>按《陈

书·文学传》,“及叔陵诛,之元乃屏绝人事,锐精著述”<sup>[10]466</sup>。《梁典》成书于后主之世,此时距离王琳覆灭已有十多年<sup>[20]</sup>,何之元仍然将王琳视作“爱纳嗣君,更绍颓运”的梁朝忠臣。何之元对王琳的评价,其实乃是王琳僚属的普遍认识。王琳战败后逃亡北齐,“总留府之任”<sup>[10]319</sup>的孙瑒决定向陈朝遣使奉表,他仍坚持萧庄朝廷具有大义名分,他对麾下将士言道:“吾与王公陈力协义,同奖梁室,亦已勤矣。今时事如此,天可违乎!”<sup>[10]320</sup>宣称他与王琳建立萧庄朝廷的性质为“同奖梁室”。王琳被陈军所杀后,故吏仓曹参军朱瑒写信给陈朝尚书仆射徐陵求取王琳首级,信中说:“梁故建宁公琳,洛滨余胄,沂川旧族,立功代邸,效绩中朝,当离乱之辰,总方伯之任。尔乃轻躬殉主,以身许国,实追踪于往彦,信踵武于前修。而天厌梁德,上思匡继,徒蕴包胥之念,终遭裴弘之眚。”<sup>[18]435-436</sup>亦将王琳在梁陈之际的活动视作“轻躬殉主,以身许国”。

可以说,借由对法统问题的阐述,萧庄朝廷获得了诸多士人的认同。光大元年(567年)袁泌临终前告诫其子袁蔓华说:“吾于朝廷素无功绩,瞑目之后,敛手足旋葬,无得辄受赠谥。”袁泌以“素无功绩”为由拒绝陈朝赠谥,暗含否认陈朝正统之意。《陈书·袁泌传》载:“其子述泌遗意,表请之,朝廷不许,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质。”<sup>[10]245</sup>陈朝坚持赠谥,则是为了表明与袁泌的君臣之义。可见萧庄朝廷对陈朝正统性的威胁,并未随着王琳政权的瓦解而终结,它依旧影响着士族的政治认同。

### 三、流寓之士与割据势力的地方统治

在梁陈之际崛起的割据势力,虽然无意建构新王朝或恢复梁王朝,但是他们为了巩固地方统治,也通过文化活动积极争取士族的支持。以新蔡为根据地的鲁悉达,便是以“招礼才贤”闻名于世。《陈书·鲁悉达传》载:“悉达虽仗气任侠,不以富贵骄人,雅好词赋,招礼才贤,与之赏会。”<sup>[10]199</sup>鲁悉达通过举办辞赋赏会等活动,表达对文化的尊重,此举凝聚了人心,“甚得民和,士卒皆乐为之用”,“招集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sup>[10]199</sup>。梁元帝江陵朝廷倾覆后,陈霸先、王琳两方势力均试图动员鲁悉达加入己方阵营,“琳授悉达镇北将军,高祖亦遣赵知礼授征西将军、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乐,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皆不就”<sup>[10]199</sup>。鲁悉达意在维系地方统治,而非卷入王朝易代。他之所以有此底气,乃在于

“抚绥五郡,甚得民和”。“民和”是鲁悉达凝结政治势力、建立地方统治的关键因素。

由此可见,割据群雄之所以礼遇流寓士人,乃在于士人是文化的承载者,而文化具有“民和”之用。会稽名士虞寄流寓晋安,得到割据此地的陈宝应的礼遇,他写信表示感谢:“寄流离世故,飘寓贵乡,将军待以上宾之礼,申以国士之眷,意气所感,何日忘之。”<sup>[10]259</sup>《陈书·虞寄传》载:“亦为寄有民望,且优容之。”<sup>[10]262</sup>陈宝应之所以“待以上宾之礼”,“申以国士之眷”,乃是因为虞寄“有民望”,能够影响人心的向背。

正因如此,流寓士人常常被割据群雄所强留,难以来去自由。《陈书·虞寄传》载:

京城陷,遁还乡里。及张彪往临川,强寄俱行,寄与彪将郑玮同舟而载,玮尝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晋安。时陈宝应据有闽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劝令自结,宝应从之,乃遣使归诚。承圣元年,除和戎将军、中书侍郎,宝应爱其才,托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为僚属,委以文翰,寄固辞,获免。<sup>[10]258-259</sup>

虞寄流寓晋安,乃是受到张彪部将劫持所致。待其在晋安定居之后,又受到陈宝应的控制。即便虞寄为梁元帝所征召,也被陈宝应以道路不通为由而强留。

与虞寄情况相同的还有出身陈郡谢氏的谢嘏。《陈书·谢嘏传》载:

侯景之乱,嘏之广州依萧勃,承圣中,元帝征为五兵尚书,辞以道阻,转授智武将军。萧勃以为镇南长史、南海太守。勃败,还至临川,为周迪所留。久之,又度岭之晋安依陈宝应,世祖前后频召之,嘏崎岖寇虏,不能自拔。<sup>[10]279</sup>

侯景之乱爆发后,谢嘏先后辗转广州、临川、晋安等地,为萧勃、周迪、陈宝应等割据势力所留,陈文帝屡次召其入朝均未成行。同一时期流寓岭南的江总写下《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抒发其欲归建康而不得的抑郁心情。诗中有言:“塞外离群客,颜鬓早如蓬。徒怀建邺水,复想洛阳宫。不及孤飞雁,独在上林中。”<sup>[19]1600</sup>

由此一来,流寓士人与割据群雄之间形成了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陈文帝在翦除割据势力时,常将他们视作一体而加以处置。《陈书·虞寄传》载:“宝应既擒,凡诸宾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诛,唯寄以先识免祸。”<sup>[10]262</sup>由于虞寄未曾任陈宝应僚属,而且在另一割据势力留异与陈朝对抗之时,他曾劝谏

陈宝应不要予以支持,故而未被视作陈宝应的同党而被惩处。《陈书·虞寄传》云:“寄知宝应不可谏,虑祸及己,乃为居士服以拒绝之。”<sup>[10]259</sup>“为居士服”,表达的是出世之志。陈文帝将虞寄比作汉魏之际避难辽东却不仕公孙氏的管宁,以“管宁无恙”之语来慰劳虞寄<sup>[10]263</sup>。与虞寄形成对照的是谢嘏,他因依附陈宝应而遭到举劾。“及宝应平,嘏方诣阙,为御史中丞江德藻所举劾,世祖不加罪责。”<sup>[10]279</sup>虞寄本来就无罪,谢嘏则是有罪而被免罪。在“不加罪”之前,谢嘏先遭到了御史中丞江德藻的举劾,这其实是陈朝有意彰显其罪,再以宽大处理来笼络人心。

与虞寄处境相同的还有袁敬、萧引等人。袁敬在江陵沦覆后流寓岭南,依附割据广州的欧阳颢。“及颢卒,其子纆据州,将有异志,敬累谏纆,为陈逆顺之理,言甚切至,纆终不从。高宗即位,遣章昭达率众讨纆,纆将败之时,恨不纳敬言。朝廷义之,其年征为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骑常侍。”<sup>[10]239</sup>袁敬虽为欧阳氏宾客,但因其有劝谏欧阳纆的表现而被陈朝视为“义”,故而不仅未被举劾,而且还被除授官职。萧引与弟萧彤等宗亲百余人在侯景之乱中投奔欧阳颢,随其进据广州。欧阳纆继任后,“引每疑纆有异,因事规正,由是情礼渐疏。及纆举兵反,时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孙挺等并皆惶骇,唯引恬然,谓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义,亦复何忧惧乎?’”<sup>[10]289</sup>岑之敬原为出使广州的梁元帝使者,江陵朝廷倾覆后留居广州<sup>[10]462</sup>。岑之敬、公孙挺的惶骇表明在当时的政治观念中,欧阳纆举兵反叛,其宾客是负有连带责任的。

虞寄、谢嘏、袁敬、萧引等人之所以没有与其他宾客同受惩处,除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中立或具有劝谏举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陈朝内部有其家门势力施以援手。虞寄为虞荔之弟<sup>[10]258</sup>,虞氏为会稽大姓,是陈朝着力笼络的三吴地方势力。谢嘏为谢弘微后裔,时南朝时期陈郡谢氏最为显赫的支系。袁敬出身陈郡袁氏,为袁泌之兄、袁枢之叔<sup>[10]240</sup>。萧引出身兰陵萧氏,为萧思话曾孙。太建二年陈朝平定欧阳纆时,袁敬兄子袁宪时任尚书吏部侍郎,后除散骑常侍、侍东宫<sup>[10]313</sup>。萧引之兄萧允任黄门侍郎<sup>[10]287-288</sup>。袁宪主管官吏选拔,又与萧允同为陈宣帝及太子近侍,袁敬、萧引被陈朝所宽宥不能说与此无关。

#### 四、陈文帝、陈宣帝的文教政策与陈朝的人心获得

尽管陈文帝、陈宣帝对士族与割据势力之间的结合持有较强的警惕之心,但由于士人因侯景之乱而流寓各地,不可避免地要与割据势力建立联系,这使得陈朝在处置群雄宾客时不得不网开一面。之所以如此,还是缘于陈朝选择了以文化为纽带来凝聚人心的途径,必然要笼络文化承载者。但让士族归心,仅仅靠政治宽容是不够的。陈文帝、陈宣帝、陈后主在学校建设、礼制推行、文教活动组织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才真正实现了人心归附。

《陈书·儒林传》云:“高祖创业开基,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sup>[10]434</sup>可知陈朝的学官设立是在陈文帝朝完成的。陈文帝设立学官、学校,乃是应沈不害上书所请。天嘉元年,沈不害上书阐述了设立学校与“立人建国”的关系。

臣闻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学。<sup>[10]446</sup>

陛下继历升统,握镜临宇,道洽寰中,威加无外,浊流已清,重氛载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礼乐,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经纬儒宫,选公卿门子,皆入于学,助教博士,朝夕讲肄,使担簦负笈,锵锵接衽,方领矩步,济济成林。如切如磋,闻诗闻礼,一年可以功倍,三冬于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扬庭观国,入仕登朝,资优学以自辅,莅官从政,有经业以治身,轺驾列庭,青紫拾地。

况复江表无虞,海外有截,岂得不开闡大猷,恢弘至道?宁可使玄教儒风,弗兴圣世,盛德大业,遂蕴尧年?<sup>[10]447</sup>

沈不害出身吴兴武康沈氏,祖父沈总曾任南齐尚书祠部郎,他自己在14岁时补国子生,举明经,累迁梁朝太学博士,治经术,善属文。名士领袖周弘正称赞他:“沈生可谓意圣人乎!”<sup>[10]448</sup>沈不害请立学校,代表了文化士族的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立学校培养人才,从中选拔的官员能够“有经业以治身”。他认为建立学校不仅是弘扬传统之举(“式稽古典”),更是圣世之兴的标志(“开闡大猷,恢弘至道”),是陈文帝的历史责任所在。陈文帝下诏答复了沈不害,诏书云:“自旧章弛废,微言将绝,朕嗣膺宝业,念在缉熙,而兵革未息,军国草创,常恐前王令

典,一朝泯灭。”<sup>[10]447</sup>陈文帝认可沈不害以文教治理国家的思路,解释了陈朝未能及时建立学校的原因,并下达“付外详议,依事施行”<sup>[10]447</sup>的旨意。

按《陈书·周弘正传》,周弘正“天嘉元年,迁侍中、国子祭酒”<sup>[10]309</sup>。可知国子学于沈不害上书的同年便得以建立,首任国子祭酒便是被陈朝称为“辞林义府,国老民宗”<sup>[10]310</sup>的周弘正。周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sup>[10]309</sup>,梁元帝曾赞誉他:“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sup>[10]308</sup>陈文帝以周弘正为国子祭酒,正是为了表达弘扬“玄教儒风”之意。天嘉二年和天嘉四年,王固两度出任国子祭酒。王固出身琅琊王氏,为梁武帝外甥。他对梁陈禅让持抵触态度,绍泰元年陈霸先执政后曾征之为侍中,然而王固并没有接受。陈朝建立后,王固移居吴郡以表达疏离建康朝廷之意。“世祖以固清静,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二年,至都,拜国子祭酒。”<sup>[10]282</sup>陈文帝以王固为国子祭酒,乃是以学官的文化性质动员政治上的疏离派改变立场,加入其阵营。在这里,彼此间的文化认同成为弥合政治裂痕的纽带。

与王固情况相似的还有吴兴沈氏的沈文阿。“及高祖受禅,文阿辄弃官还武康,高祖大怒,发使往诛之。时文阿宗人沈恪为郡,请使者宽其死,即面缚锁颈致于高祖,高祖视而笑曰:‘腐儒复何为者?’遂赦之。”<sup>[10]434-435</sup>沈文阿在梁陈易代之际弃官还家,是持有异议者。陈文帝即位后,以之兼国子监博士,令于东宫讲孝经、论语。同出吴兴沈氏的沈德威,“梁末清未,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不倦,遂治经业。天嘉元年,征出都,侍太子讲礼传。寻授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sup>[10]442</sup>。陈文帝以太学博士安置沈德威,反映了其对隐士这类政治疏离派的政策,即通过文化领域来沟通朝野。

此外,国子学、太学学官还用来安置平定割据势力后归附陈朝的士人。陈文帝是平定会稽的主将之一,流寓会稽的士族如出身太原王氏的王元规,便是在陈文帝即位后被启用“领国子助教”<sup>[10]449</sup>。平定王琳后,陈文帝亦用学官安置流寓士族。如周弘正之弟周弘直,“王琳之举兵也,弘直在湘州,琳败,乃还朝”<sup>[10]310</sup>,天嘉中被陈文帝任命为国子博士<sup>[10]310</sup>。平定陈宝应后,陈文帝手敕用虞寄为衡阳王府僚,并对虞寄说:“所以蹇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也。”<sup>[10]263</sup>不久后,陈文帝将虞寄除为国子博士。

陈文帝对待疏离派、隐逸派、流寓士人的政策是:以文化为纽带,通过设立学官、学校,将其纳入王朝的政治体系之中。这是一种以文化认同来缝合政治异议的处置方式。陈宣帝翦除割据广州的欧阳纥势力后,初步实现了南方的统一,其文教政策更为积极。陈宣帝与太子陈叔宝,通过举办礼制仪式及组织文化活动,展现文化领导者的姿态,激发士族的王朝认同。

太建三年秋八月辛丑,太子陈叔宝亲释奠于太学<sup>[10]80</sup>。释奠礼为魏晋南北朝的官学学礼,皇帝或皇太子通经后,于辟雍或太学、国子学等场所祭祀先圣先师。曹魏齐王芳通经,由太常释奠于辟雍。两晋南朝太子通经,则由太子亲临太学或国子学行释奠礼,有时皇帝也会幸学<sup>[21]</sup>。太建三年的太子亲释奠于太学,是侯景之乱后首次举行释奠礼,这彰显了陈朝对于魏晋南朝的继承,尤其是对梁朝正统的继承。《陈书·儒林传》云:“武帝或纡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sup>[10]433-434</sup>《陈书》以梁武帝“释奠先师”为“一代之盛”的重要表现,并以此为评价陈朝的标准。奉诏编撰陈朝历史的姚察曾亲身参与了太建三年的释奠礼,深知该行礼具有阐明陈承梁制之意,《儒林传》的这一编撰思想正是太建三年时政治意识的体现。

太建三年释奠礼的行礼主体是太子陈叔宝,参照至德三年(585年)陈后主为太子举办的释奠礼,释奠礼除了祭祀先圣先师外,或当还有致敬发题考察太子学问的环节,“孝克发孝经题,后主诏皇太子北面致敬”<sup>[10]338</sup>。“皇太子北面致敬”,从仪式层面体现了皇权对于文教的尊重。参与释奠礼者,除东宫宫臣外,陈朝百官亦当参与。在至德三年的释奠礼中,“皇太子入学释奠,百司陪列”<sup>[10]338</sup>。在此场合中,“皇太子北面致敬”,还具有向政治体系中的“百司”宣扬文教之意。东宫宫臣则需要以赋诗等方式将皇太子礼敬文教之用意尽量呈现出来。

《陈书·陆瑜传》载:“太建二年,太子释奠于太学,宫臣并赋诗,命瑜为序,文甚赡丽。”<sup>[10]463</sup>与《宣帝纪》的太建三年说不同,《陆瑜传》将陈叔宝行释奠礼系年为太建二年。从其记述可知,东宫宫臣均须在释奠礼的场合赋诗。现存江总《释奠诗应令》,描绘了释奠礼中皇太子的崇学姿态(“肆礼虞庠,弘风阙里,降心下问,劳谦让齿”),及其受到百官的支持(“五方从德,百辟倾耳”),士人的拥护(“济济耆生,莘莘胄子”),以及天下人心的归附

(“肃仰鸿化,恭闻盛典”)[22]94。江总在太建年间长期担任东宫宫臣,他经历过太建三年、至德三年两次释奠礼。诗中所描绘的正是陈朝崇尚文化而得人心的场景,江总以“希代明王,应期圣主,裁成品物,奄有区宇”[22]94来总结他所处的时代,这表明陈朝借用文化向心力完成了对政治认同的塑造。

## 结 论

自汉魏之际开始,以文化为纽带来凝聚人心,成为政权建构的重要方式。这主要是缘于魏晋南北朝三百年间政治上的分裂之局,文化认同成为比政治认同更为基础的人际纽带。借助于文化向心力,政权能够实现人心归附,完成政治认同的塑造。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化承载者的士族,便成为各方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这一政治逻辑鲜明地体现在梁陈之际的历史中。经历侯景之乱后,南朝疆域内呈现出群雄割据之局。无论是旨在建构新王朝的陈霸先,还是宣称延续梁朝国祚的王琳,抑或是意图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均需要争取士族归附以塑造政治认同。

陈武帝翦除各方势力的过程,同时也是将地方诸姓纳入政权的过程。如平定割据会稽的张彪后,陈武帝着力启用了会稽士族虞荔。在称帝前夕,陈武帝在各州恢复中正之职,规定“中正押上”为选官的必经程序。陈朝建立,其官制按照士族的立场划分清、浊官。陈朝保障士族权利的目的在于换取其政治支持。陈武帝举办了众多的文教活动以迎合士族的文化需求,同时也借助盛大的活动场合来呈现人心的归附。

陈武帝迎合士人政策的出台,与其面临萧庄朝廷的挑战有关。在陈朝建立后不久,占据湘州、郢州的王琳支持梁元帝后嗣萧庄即位,严重动摇了陈朝的正统性。陈武帝的文教活动,如永定二年三月乙卯向群臣赋诗,便与当月萧庄称帝的政治局势有关。支持萧庄朝廷的,除了王琳势力,还有若干士族。如陈郡袁氏、庐江何氏、南阳刘氏、吴郡朱氏等侨、吴士族均有人物出仕萧庄,并担任门下、中书等决策机构的主官。这些士人以其文书制作、历史撰述塑造着对萧庄朝廷的正统性认同,其影响甚至贯穿于陈朝始终。

梁陈之际的地方势力虽然未必有建构正统王朝的目标,但出于建立地方统治的需要,也会积极招纳流寓其地的士人。以新蔡为根据地的鲁悉达、占据

闽中的陈宝应、控制广州的欧阳颢等人,其治下均有不少流寓士人。他们以礼贤纳士的方式赢取声誉、巩固统治。在梁陈之际的政治斗争中,群雄与宾客常会被视作同一势力。陈文帝、陈宣帝翦除各地割据势力时,会将其宾客进行惩处。但由于士族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交际网络,陈朝也会将群雄的宾客吸纳进政权,如依附陈宝应的虞寄、谢嘏,依附欧阳颢的袁敬、萧引,皆因家世人脉而得以入仕陈朝。

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惩处依附群雄的士人外,陈文帝还以学校设立为契机,通过将疏离派、隐逸派、流寓士人任命为学官,将之纳入政治体系之下。这是一种以文化认同来缝合政治裂痕的方式。陈宣帝、陈后主则通过举办释奠礼等文教仪式,让陈朝取得了文化领导权,进一步激发士族的王朝认同。陈朝政治认同塑造的完成,归根结底是借助了文化向心力,这是南方在侯景之乱后能够重归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

## 注释

- ①关于梁陈之际王朝建构及地方统治的研究参见以下著作: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吕春盛:《陈朝的政治结构与族群问题》,稻香出版社2001年版。胡阿祥:《陈朝疆域变迁与政区建置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卞孝萱:《陈武帝“汉高、魏武之亚”、“无惭权、备”驳议——宋、齐、梁、陈开国四帝简论之一》,《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牟发松:《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李浩博:《〈陈书·高祖纪上〉所见侯安都“定南中诸郡”事释证与推论——以军事地理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2023年第1期。李磊:《陈朝的文化认同与江左王朝的政治存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②梁敬帝完成梁陈禅让后,陈朝封之为江阴王。《陈书》卷二《高祖纪下》,第36页。《南史》卷六十八《刘师知传》,第1667页。③《陈书》卷二十四《袁宪传》,第312页。陈郡袁氏在侯景之乱中与简文帝的关系,参见李磊《吴郡地方势力与梁陈之际的王朝重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④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614页。胡阿祥:《陈朝疆域变迁与政区建置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 [1]王中江.权力的正当性基础:早期儒家“民意论”的形成和构成[J].学术月刊,2021(3):5-16.  
[2]冯渝杰.“神圣汉家”何以神圣[J].学术月刊,2024(10):179-190.  
[3]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J].文史哲,2011(4):64-85.  
[4]刘雅君.建安后期的邺下从游与曹氏造魏:社会与国家关系中曹魏建国的舆论运作[J].史林,2022(2):14-23  
[5]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38.  
[6]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96-613.

- [7] 李磊. 门阀政治传统与陈朝的王朝建构[J]. 历史教学问题, 2022 (6): 44-51.
- [8] 李磊. 吴郡地方势力与梁陈之际的王朝重构[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4(1): 134-143.
- [9]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10]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11]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2]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13]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159-164.
- [14] 牟发松. 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J]. 中华文史论丛, 2006(3): 213-233.
- [15] 严耀中. 江南佛教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90-93.
- [16]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44.
- [17] 万斯同. 陈将相大臣年表[M]//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 二十五史补编: 第4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4435.
- [18] 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19] 李昉. 文苑英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20] 唐燮军. 何之元《梁典》述论[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7(3): 87-93.
- [21] 李磊. 四世纪的“崇圣”竞争与东晋太学、国学之兴废[J]. 孔子研究, 2021(1): 126-135.
- [22] 许敬宗, 罗国威.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94.

## Cultural Centripetal Force and Political Identity Shap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Chen Dynasty Unifying the South

*Li Lei*

**Abstract:** The new path of shaping political identity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a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ruling and opposition parties through cultural identity and w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During the period of Liang and Chen, whether it was Chen Baxian or Wang Lin, who aimed to construct a dynasty, or local forces who sought to divide their territories, they all shaped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by winning the hearts of scholars. The process of Emperor Wu in the Chen Dynasty eliminating various forces was also a process of incorporating local aristocrats into the political power. On the eve of proclaiming himself emperor, Emperor Wu in the Chen Dynasty restored the position of Zhongzheng in various states and stipulated that “Zhongzheng’s appointment” was a necessary procedure for selecting officials. The official system of the Chen Dynasty divided officials into clear and turbid ones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 of the gentry. Emperor Wu in the Chen Dynasty held numerou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o showcase the cultural consent with scholars. The Chen Dynasty’s policy of catering to scholars was related to the challenges it faced from the Xiao Zhuang court. In addi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Wang Lin, there were also aristocrats who supported the Xiao Zhuang court, such as the Yuan family of Chen commandery, the He family of Lujiang, the Liu family of Nanyang, and the Zhu family of Wu commandery. They shaped their recogni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Xiao Zhuang court through document production and historical writing. Separatist forces such as Lu Xida, Chen Baoying, Ouyang Wei, and others recruited local scholars to gain reput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ir rule. While eliminating separatist forces in various regions, Emperor Wen in the Chen Dynasty used cultural identity to mend political rifts. He took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as an opportunity to appoint political isolationists, hermits, and exiled scholars as academic officials. Emperor Xuan in the Chen Dynasty and Emperor Chen Houzhu, on the other hand, stimulated the dynastic identity of the gentry through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eremonies such as the Shidian ceremony. Cultural centripetal forc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the identity of the Chen Dynasty.

**Key words:** Chen Dynasty; gentry; cultural centripetal force; politic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王 轲